

丰富的偏激

——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

魏继洲 著



丰富的偏激

——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

魏继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丰富的偏激: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魏继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61-2238-9

I. ①丰… II. ①魏… III. ①钱玄同 (1887~1939) —评传
IV.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861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92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邓国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这固然是由于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也与研究者的认识和心态很有关系。人们曾热衷于遥望“五四”的旗帜和它所指引的方向，而对其历史现场却缺乏细致的审察和思考。据说这种状况现在已有了改变：深入研究与反思的新成果都在陆续涌现。

我曾从理论建设的角度观察过新文学运动，觉得推动历史进程的运动大抵是蓄势而发，但不见得在主观上都有足够的准备。现在来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知道那时所谓的理性思考其实是很薄弱的。胡适说，文学革命最主要的理论家就是他和周作人。但《人的文学》有方向性的指引而无理论的质感。就文体而论，其实也还是一篇杂感。作者似乎无意于充当理论家，就如陈独秀一样，只是把旗帜举了起来，深入论证的后续的成果并没有出现。胡适呢？他推动语言形式的变革，有“白话圣人”之称，固然居功至伟，但他的喧嚣一时的“死文学”、“活文学”的论断，现在看来，却是谬见的成分居多。而其难于自圆其说的《白话文学史》和“活文学”、“死文学”的论断，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质疑或批判，且在我们的观念中，总还是挥之不去。我想，当五四文学革命发生时，有人举旗，有人呐喊，有人捅窗子，都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无须苛求前人。但后面跟着前进的人，若只保留住发难期的一些印象化的记忆，却是不足，是与这个运动本身缺乏理论建设作深度的支撑有关系的。

我的这些感慨，是一时的感触，与魏继洲先生的专著《丰富的偏激——论五四新文学中的钱玄同》并没有特定的关系，但因为钱玄同是

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便也应该是有些关系。他是那时有过轰动效应的新文化运动的前驱，是战阵中的猛将。他在“五四”时期的“捅窗子”的举措仍然可爱地在我们的印象中存在着。他是切入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富有意味的个案。

继洲最初是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研究有兴趣，花费过不少时间去阅读清末民初的期刊和著述，后来才盯住了钱玄同。他在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之后再进入个案的研究，既有必要而且对他的研究也是有利的。钱玄同研究其实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实在地说，钱玄同与文学的结缘并没有很深的根底。他在文学革命中的表演也只是昙花一现。这在本为学者而卷入运动旋涡的人当中是常见的现象。但他的言行的灼眼的光芒却又几乎盖住了他作为文字学家的本来面目，他的个人的性格气质使他扮演过那时的先锋派的角色。因此人们记住了他在文坛上的狂言，反而忽略了他作为学者的身份，同时也简化了他作为一位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人物的面目。这对于参与了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的钱玄同来说，是幸与不幸？历史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记住了一位文字学家，对于钱玄同来说，总应该说是难得的运气罢。但又因为单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钱玄同，可说的话似乎不多，因此他便又成了文学研究者们眼中的所谓“冷门”。我想，著者又正是有感于此，才愿意花费很大的精力，致力于揭示他在文学革命中的复杂的表现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典型性的存在。

这部专著以它的多面的介绍和论述，拓展了我们对钱玄同的认识。我们在阅读中，可以看见他以嬉笑怒骂的姿态介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偏激”与“衡平”的双面，看见他的复古心态遭遇新思潮时“求真”与“致用”的矛盾，看见他以声韵训诂大家而参与新文学运动时的“文”与“语”的纠缠，看见他以杂感创作反叛古文义法时的“立诚”与“废话”的统一。著者希望由此而摹写出他的个性特点，并对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著者似乎也是在提醒他的读者：在中国，新与旧，古与今，中与西，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貌似互不相容的东西，竟可以活生生地统一在一个五四学人的身上。

不需说，研究和反思五四文学，是以对五四新文学的充分的肯定为前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青春的激情是永在的。要理解那时的偏激，必须理解它的根源。国家的积弱，旧文化根基的深广，理论建设的缺失，都会使那时一些变革者的幼稚和偏激难于避免。也因此，我们不会如目前的一

些新的偏激者那样，以放大失误去否定新文化运动。而富有深度的能切中肯綮的新文化理论的探求和建设，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艰难的使命。

继洲在从事教学实践数年之后成为中山大学的博士生，毕业之后，仍然回到他的教学岗位上。读博士期间，他很珍惜学习的机会，虽有各种人到中年的烦扰，而能专注于学术，并渴望在学术上有所创新。现在，他的学术著作即将出版，我向他表示祝贺，并遵嘱写下了这些文字。我期待他学问日深，在前进的路上，领略到更多的绚烂的学术风景。

草成于中大蒲园寓所

2012年4月20日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求真”与“致用”	
——当复古心态遭遇新思潮	(16)
第一节 知识涵化及其异变	(16)
第二节 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34)
第三节 游移于互助与竞争之途	(52)
第二章 “偏激”与“衡平”	
——介入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71)
第一节 “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	(71)
第二节 “双簧信”:虚张的对立	(89)
第三节 小学大家与《尝试集》	(107)
第四节 语言视阈中的小说与戏剧	(125)
第三章 国“文”与国“语”	
——直逼新文学的语言核心	(146)
第一节 理想的文学语言	(146)
第二节 被书写的汉语:探寻与决断	(164)
第三节 文学叙事话语规范的重建	(181)

第四章 “立诚”与“废话”

——以杂感创作反叛古文义法	(199)
第一节 以“立诚”拆解道统	(199)
第二节 “白话体”、“杂”感体与文体游戏	(216)
第三节 激切、峻急的整体之美	(234)
结语：参与彰显价值	(250)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69)

导 言

一 选题背景

“五四”是一个洋溢着激情与梦想的时代。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社会学说的引入有力地改变了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思想的驳杂与混乱是难免的，但是一代人长期被束缚的心灵却由此拥有了一个自由飞翔的空间。自由地破坏，对传统的质疑是激烈而不留情面的；大胆地创造，对未来的畅想是热情而无所顾忌的。一代人以青春的无畏对以经典文本阐释为核心价值源泉的文化传统进行严厉的审视，借助对传统的重估，有力地颠覆了早已不堪重负的传统文化心理，并促使其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正如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所表现的那样，这是一个在涅槃中新生的时代，活跃在这时代中的是一个在涅槃中新生的自我。它投向传统的那轻蔑的一瞥，可能具足了无知与幼稚的特征，但却有一种无比耀眼的生命光华透过这无知与幼稚喷薄而出。

文化激进主义是这一特殊时代的思想底色。不是某一个人思想激进，而是一代人思想激进；激进的思想并非仅仅停留在书斋里，而是从思想到实践、从文化到政治。这是一种颇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难道个性解放的时代主旋律只能以集体的名义奏响？个人启蒙的目标仅仅是走向启蒙的整体性？如果细细寻绎，其实并非毫无缘由。一代五四学人无不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长期在一种作为有机整体的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具体地说，是传统培养了他们作为传统颠覆者的整体观。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实现了高度整合，在“五四”时期它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受到抨击，而向它发出责难的又是一个新的思想系统，一个以科学与民主为观念核心的思想系统，尽管这一系统表面看上去并非整齐划一。但是直接刺激一代

五四学人形成激进主义文化心态的是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一代五四学人的内心深处大都潜藏着对民族前途的忧心，他们深恐中国如果不及时变革图新，会在将来不远的某一天从“世界人”中被开除出去。自1840年以来中国被迫在屈辱中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的尊严被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地践踏，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这种现实，而那些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更是视其为切肤之痛。他们痛切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并不能挽救疲弱的中华民族于水火，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诸种思潮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严重脱节，为民族长远发展计，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行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重建，以西方先进文化来置换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二是对现代社会的憧憬。现代社会的建立是文明进化的一项系统工程，所谓现代化乃是“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①。那么中国传统如何才能实现现代性转化？在推进国家强盛、民族解放与中华振兴这一方面，西方列强发展壮大的事实为五四学人提供了一个最为直观的参照。在强烈而鲜明的中西对比中，一种全面质疑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思潮产生了。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反思正是这一激进文化态度的艺术表达。当一代五四学人选择了文化重建作为中国跨入现代之途的开端，全面否定传统旧文化、全盘吸收西方新文化的内在焦虑也就成了一种广为流行的精英心态。

不管它曾经存在多少先天缺陷，五四新文化所标举的激进批判精神都是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精神动力的。在从各种层面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进行清算的当下，如何另辟蹊径对其进行反思是一个问题。也许激进和偏激并无本质差异，本书还是认为评价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应在激进和偏激之间有所区分。所谓激进乃是一种坚持使政治观点与行动走向极端的倾向，或者采用更为广义的表述，是一种对任何领域的向人类行为（如艺术或学术领域）已确定的观点进行挑战的倾向。^② 偏激的内涵也大致如

^① [美]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② [英] A. 布洛克、O. 斯塔列布拉斯：《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李瑞华、肖俊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3页。

此。但二者的区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激进与保守——或者如某些学者认为的与自由——相对，具有形而上色彩；偏激与衡平相对，更具形而下特征。激进作为一种“主义”，可以是对现状不满的表达，可以是政治与社会变革方面的强烈呼吁，倾向于走上理论一途；而偏激则是直面某些现实问题时缺乏所谓公允原则与平正态度，其突出表现是产生于实践环节的一些过火言辞和情绪。

“五四”是一个充斥着偏激思想与言说的时代。新文学阵营割断与传统的关联是偏激，林纾以抱残守缺的态度对抗新文学的“西化”是偏激，学衡派号称眼光中正，其实当他们以纠偏者的姿态站到新文学的对立面时，同样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偏激的窠臼，其思想特色在于不激进，而非不偏。在新文学阵营中钱玄同的偏激尤为“名重一时”。以偏激作为本书研究的立足点只是希望有效地切入五四新文化发展现实的细密之处，而研究偏激的丰富性则是希望透过五四时期所谓以偏概全的言说，探寻贯穿了一个时代的歧路丛生的思想流变的某些方面。

二 研究对象

本书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钱玄同为研究对象。钱玄同是小学与经学大家，也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新文学活动家及杂感写作者。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之一，他介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对“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的指摘向传统文学发出了犀利的一击，与刘半农合作发表“双簧信”，使文学革命的影响迅速扩大。作为国语运动的中坚力量，他参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建设，对胡适、周作人等的文学语言主张多有回应和发挥，为文学革命与国语建设的结合作出了切实的贡献。他还是《新青年》“随感录”作者群的重要一员，同时也在《语丝》、《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公报》等报刊发表了数量不菲的杂感作品，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文章款式表示了明确的否定。钱玄同以其偏激的文化姿态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为人广泛关注。

钱玄同是偏激的，但是偏激之中却有丰富性存焉。

钱玄同的偏激与性格有关，情绪冲动本是一个人在心理未臻成熟之时的习惯性表现。但是我们关注钱玄同的偏激目的显然不在于发掘其病理学价值，而在于探究其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得失。他从传统文化教育中来，却养成了一种拒绝中庸之道，全然不惧走入极端的文化人格，而这也是他

看待五四文学新变问题一贯的思维方式。他站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对立面，义无反顾地表达了对于中庸之道的反叛与背离，并因其不合常规而在中国文化传统——甚至文化现实的映照下成为异类，可是他的偏激仍然是时代文化主题变迁的产物。问题的价值就在于此：钱玄同是否因偏激而曾经接近真理暂且不说，我们至少可以在思想与表达自由的大背景下更为清晰地审视“五四”时期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现代对于传统的抗拒是一方面，现代性诉求内部的裂隙则是另一方面。

钱玄同以偏激的姿态向旧文学发起挑战，因而并不十分在意于学理规范。他以“妖孽”、“谬种”为选学、桐城文派命名，生动形象的类比明显缺少学理探究的平正宽容。他与刘半农合作发表“双簧信”，固然壮大了新文学的声势，但是炒作既已游离于文学发展的正途，而虚构新旧文学阵营的人身攻击与人格侮辱更是有悖于正常的学理论争。他以语言学家的眼光审视文言与白话之争及其在文体领域的连锁反应，所建立的视角是独特而富有价值的，但是过分倚重语言进化论而对汉语变迁的定性描述显然是粗疏的。他率先以随感录的写作向桐城派所代表的古文传统发起挑战，此后也多有杂感见诸报端，但是信马由缰的写作方式，再加上对散文体式规范的有意拒绝，使他的杂感最终未能汇入“五四”散文写作的主流之中，甚而至于被文学史的尘埃遮蔽，几近不为人知。

钱玄同对学理规范的轻忽其实是思想自由的一种言说策略。正所谓“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悒于心”。^①向旧文学发起攻击且须矫枉过正，钱玄同的矫枉过正却不是轻薄浮泛，而有极深固的学术根底。在经学研究中钱玄同接受了乃师章太炎“六经皆史”的观念，并经过再发挥而形成了个人的“疑古”思想，即对于一切古籍均须用历史的眼光来辨真伪，订伪失，正伪误，在文学革命运动中他对旧文学的严厉审视，主要还是其经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投射。钱玄同虽然长期浸淫于传统文化，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到来，能够吸引他的已不是深居书斋、皓首穷经的学者生涯，而是五彩斑斓的时代生活。在他看来任何“求真”都必须接受“致用”的检验，也正是因为从现实之用出发，他倡

^① [汉]王充：《论衡·艺增篇》，见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75页。

言破坏旧文学，投身建设新文学，并极力在破坏与建设之间作出区分，使二者不至于相互妨碍。他偏激却不固守于偏激，破坏之时尽管过火之言辞迭出，一旦进入建设领域则毫不吝惜地对自己的过火之言作出修改或颠覆。

进而言之，钱玄同以语言学家参与新文学运动其偏激的介入却涉及了文学革命的多种角度与多种知识呈现。主要包括：其一，文学思想传播层面：在对胡适、陈独秀的响应中，他提出“白话体文学说”、“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明确了文学革命的目标与对象，而“双簧信”在宣传文学革命主张的同时，则预设了文学革命的基本方式。尽管不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却是胡适、陈独秀不能取代的。其二，文体形式实验层面：他从“致用”出发提出“应用文改良十三事”，他把文学新变与应用问题相关联，推动了《新青年》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和横行排版，尤其是从语言变革的流程中就诗歌、小说与戏剧的文体价值重心与发展方向发表了不少个人心得。其三，语言文字革新层面：他深入研究言说、书写与意义的关联，鲜明地指出汉语汉文与封建纲常名教互为表里的同构关系，在对“言文一致”的重新审视中详细探讨理想的文学语言的要旨，为重建全新的文学叙事话语规范进行了许多切实的探索。其四，文学创作实践层面：他参与新文学运动的最着力处在语言文字，他的杂感写作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以语言文字之用为基础对桐城义法表示了大胆反叛，为现代散文实践迈出超越传统的第一步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道奇特的文学史景观，钱玄同以其独具个性的思想言行丰富了偏激的内涵，也使“偏激”的色彩变得异常绚烂，为后人重新认识所谓“偏激”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本书拟对钱玄同偏激的个性与文化人格追根溯源；对其偏激文学观的复杂性及代表性进行评述；对其偏激的语言观进行评析，并以个案研究介入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探讨；对其杂感创作与赞倡文学革命之同构关系予以梳理。希望能够由此进入其偏激之幽微处一探究竟。

三 研究现状述评

钱玄同首先是一个学者，过去的钱玄同研究也大多从他的学术研究活动着眼。钱玄同在世之日已有关于他的评述文字，但多为散见的只言片语。如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5年），辟专节研究“疑古

思潮”，把钱玄同置于疑古思潮发展的总趋势之中，认为“钱顾二氏对于《六经》的辨伪，这真是中国思想一个大的改革。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割断，孔子思想演说固然失掉庇护之神，而《六经》也成了失掉灵魂的僵尸”。而“中国古史，经过这次的辨伪，把四千多年的历史，只余了二千多年；古代灿烂的古史，都成了虚构、伪书的结晶品。使中国思想上，史学上起了大的变革”^①。

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1939年）为第一篇全面评价钱玄同的文章。文章依据国语运动发展的线索对钱玄同在国语运动中的活动进行了全面评述，作者与钱玄同曾经共同致力于国语运动，因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是关于钱玄同生平较为权威的一篇传记性作品，史料价值较高。但是其缺憾正如周作人指出的：“实在却只讲的是国语运动，不小心的看去会得弄不清这是黎传附钱呢，还是钱传附黎。”^②而对钱玄同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介绍尤为简略。柳存仁的《纪念钱玄同先生》（1940年）评述钱玄同在古史辨伪方面的成绩，并认为：“钱先生可以算是承袭着清代道咸间今文家极盛的余绪，而又启发了现代的用科学的治学方法来扩大辨伪运动的第一个人。”^③王森然的《钱玄同先生评传》（1941年）^④简要勾勒了钱玄同的生平经历，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钱玄同的主要学术活动系年。殷尘的《钱玄同先生的学术思想》（1946年）评述了钱玄同在思想、音韵、文学诸方面的贡献。如他从文白对立的角度指出：“玄同先生于破坏方面，与那时的胡、陈、鲁迅诸大师并无异旨，他的建设则着力于注意新文字与音韵，音韵之学是玄同先生最所专长的。”^⑤着实指出了钱玄同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独特贡献。魏建功的《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1946年）则记录了钱玄同生活与学术方面的一些事情，以表达对乃师的敬仰与怀念。此外，还有舜扬的《钱玄同自编文集记》（1943年）、一丁的《钱玄同风范》（1943年）、荀目的《钱玄同与鲁迅》（1945年）等记述钱玄同风采的短文。

①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18页。

②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36页。

③ 顾颉刚：《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④ 该文最初发表于《中国公论》第5卷第4—5期，1941年7—8月。

⑤ 殷尘：《钱玄同先生的学术思想》，《图书月刊》1946年第3期。

1949年以后的钱玄同研究有周作人的《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①该文以叙事怀人为目的,其中对于钱玄同文字复古的得失、经学研究由颇宗今文到专宗今文的转变、文学革命运动中的贡献等也颇有会心之论,他认为钱玄同“说话虽然稍为偏激一点,但意思是完全好意的”。“主张看似多歧,其实总结归来只是反对礼教,废除汉字乃是手段罢了。”陈敬之的《钱玄同》(1964年)从“毕生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为文学革命的一支生力军”、“主张废除中国文字的错误”、“是中国第一篇新小说的催生者”几个方面对钱玄同一生的功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方师铎的《钱玄同著作及其生平》(1965年)介绍钱玄同的生平并以编年的形式开列出了主要著作。蒋心焕、查国华的《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和斗争——学习鲁迅札记》(1976年)认为鲁迅和钱玄同走上革命道路的动机完全不同,把鲁迅与钱玄同后期的疏远看作两种立场、世界观,两条道路、两种结果的对立,从而为文学批评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姜德明的《鲁迅与钱玄同》(1979年)以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为线索评述钱玄同的功过,因其立论前提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因而在对钱玄同的评价上就少了一些客观的眼光。钱秉雄、钱三强、钱德充的《回忆我们的父亲——钱玄同》(1979年)分五四运动、文字改革、生平三节回顾了他们父亲的一生。臧思钰的《钱玄同的名与人》(1981年)整理钱玄同不同时期的名字,从一个侧面入手介绍了钱玄同的思想追求与人格魅力。

任访秋的《钱玄同论》(1981年)为文学史领域的钱玄同研究确立了大致的格局,他把钱玄同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归纳为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鼓动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双簧信事件”,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致力于散文创作几个方面;对于钱玄同治学态度中的进化论思想、求真求适的观念也有论及。但是对于钱玄同思想形成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对于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贡献的归纳也有待完善。刁培德的《为新文化冲锋陷阵——五四时期的钱玄同》(1984年)简要介绍了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动,并尝试予以评价。叶淑穗的《关于钱玄同对鲁迅的“表示”》(1984年)介绍了钱玄同写作《我对于周豫才

^① 该文首次刊载于1984年4月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写作时间在20世纪60年代初。

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的背景。马蹄疾、彭定安的《鲁迅与钱玄同》（1985年）介绍了鲁迅与钱玄同自东京相识起，由亲密到疏远的交往经历。陈漱渝的《钱玄同日记中的鲁迅》（1985年）梳理了钱玄同与鲁迅的关系，从钱玄同的日记未刊稿中发掘了一些新的材料，为钱玄同研究在材料创新上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吴相湘的《钱玄同与国语运动》（1986年）^①基本材料多取自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只是稍加改写。曹述敬的《钱玄同年谱》（1986年）收集钱玄同生平经历、学术研究、文学活动等方面的材料相当完备，尽管某些年代的叙述较为简略，但它无疑为钱玄同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该书附录收入了黎锦熙、魏建功、周作人评述钱玄同的文章，并对上述文章中的谬误之处进行了详尽的考订；只是由于体例限制，该书在“钱玄同研究”上没有全面展开。李可亭的《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钱玄同》（1987年）对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中的活动进行了粗略却较为全面的扫描。钱理群的《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复古、欧化及其它》（1988年）论述了发生在《语丝》上的两次论争，第一次是关于复古与反复古的论争，第二次是关于“国民文学”个性自觉的论争，这两次论争至今仍然不太为人关注。

杨天石的《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1989年）利用当时未刊稿《钱玄同日记》的资料，研究钱玄同文化思想变迁的历程，重点分析了钱玄同由国粹派向“新青年”转变的原因，客观地评价了钱玄同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李大遂的《略述钱玄同的汉字简化理论与实践》（1989年）评述了钱玄同为汉字简化理论的建设及汉字简化运动的开展所作的贡献。李可亭的《激厉奋迅 冲破罗网——钱玄同文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1990年）把钱玄同汉字革命的实践划分为废止汉文、倡导世界语、国语罗马字的设计和制作、简体字的选用和推行四个阶段。吴奔星的《钱玄同研究》（1990年）一书由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钱玄同、钱玄同年谱、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三部分组成，正如作者所言，“名为《钱玄同研究》，实际上只是为研究钱玄同先生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料，作为开展真正的研究工作的起点”^②。吴锐的《钱玄同评传》（1996年）主要依据黎锦熙《钱玄同先生

^① 该文载于吴相湘《民国人物列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吴奔星：《钱玄同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传》和曹述敬《年谱》扩展而成，无论材料还是观点都没有太多创新。张清常的《钱玄同的反帝爱国的〈说文〉研究课》（1995年）回忆了“九一八”事变后，钱玄同在《说文》研究课上的反帝言论。谢村人的《书斋生活及其危险：从钱玄同的一封佚信想到的》（1998年）将钱玄同1928年的一封佚信和1939年1月14日的一封信相比较，认为钱玄同在后一封信中使用的“弟师黄再拜”一语已经表明了思想的倒退。并根据钱玄同在承德失陷之后谢绝饮宴，而1938年3月29日则与周作人参加了亲日分子何克之的宴会，判定钱玄同会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成为第二个周作人。文章裁剪事实，立论偏颇，论点与论据之间缺乏直接因果联系。召南的《钱玄同的盖棺论定》（1998年）举出《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与钱玄同去世以后国民政府的褒扬令，据以反驳。姚力的《对“书斋生活及其危险”的一点辩证：与谢村人先生商榷》（1998年）则进一步罗列了大量事实证明钱玄同是一个具有铮铮铁骨和一身正气的中国知识分子。

杨天石的《论钱玄同思想——以钱玄同未刊日记为主所作的研究》（1999年）评析了钱玄同“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反传统思想，欧化思想，自由主义思想，整理国故思想，文学革命、汉字革命思想，等等。孙郁的《偏执的真人》（1999年）为《钱玄同文集》的出版而作，内中评述了钱玄同的思想、学术及文学活动，对钱玄同的评价多有精准之论。李可亨的《传统原罪心态下的西学乌托邦之梦——论五四时期钱玄同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1999年）认为钱玄同的激进是一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文化心态，是传统原罪心态和现代化乌托邦梦想交织在一起的情绪化特征，是民主科学旗帜下的变革反应。刘贵福的博士论文《钱玄同思想研究》（2000年）认为“五四”时期钱玄同跳出国粹派，对中国传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疑古辨伪、汉字革命、学习西方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主张，这些主张是“五四”时期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章深入挖掘未刊的钱玄同日记，在材料运用上具有鲜明特色。沈永宝的《论钱玄同的“白话文体说”》（2000年）对钱玄同的新文学建设主张梳理整合，认为“白话文体说”是钱玄同新文学理论的核心，此说推动了胡适白话文学理论体系的最后完成。徐立新的《钱玄同：最后的经学及其转变》（2001年）以近代思想文化的内在理路为视角，分析钱玄同继康有为、章太炎之后形成的经学思想的特点，并认为钱玄同使山穷